

# 寂寞中的乐趣

张宪光

新出版的《小津安二郎全日记》几乎就是一部吃货大全

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中的《蓼科日记抄》。独自在家时，他偶尔下厨。一旦喜欢上某个菜，便自己动手做，连吃几次亦不厌。如酒糟鲑鱼，1955年1月中下旬就做了三回，不停地“好吃”。3月2日日记里写道：“将昨天的米饭蒸了蒸，吃关东煮、熏制鲑鱼。寂寞中的乐趣也。……就着海蜇、拌墨鱼、咸鲑鱼好，喝汤。后，吃熏鱼茶泡饭。日日是好日。……今天传来黄莺的啼叫声。”一直到几年后，他还是喜欢做这道菜。有段时间，还迷上了炸猪排。有意思的是，小津喜爱食物修辞。他说自己是开豆腐店的，只做豆腐，“偶尔去做咖喱饭或炸猪排，不可能好吃”。又说彩色片像用彩釉的碗吃炸虾盖饭，黑白片就像用青花碗腌茄子，各有其美——这也是他对电影风格和美学的坚持吧。

除了吃，便是喝酒与睡觉。日记中“酩酊大醉”“醉醺醺”是高频词，让我们想起他电影中的许多酒局。他一度想戒酒，却几乎没有戒过。在蓼科日记中，他还有一段戏言：“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酌酒杯数越少，越是无法出现佳作。佳作因推杯换盏之数而定，酒满杯盈才是真。《浮草》成为杰作并非偶然，看那厨房，空瓶遍地不胜数。自吹自擂，记私语一言，聊以自慰。如何？”看来要拍出好电影，一定要多喝酒。去世两年前的那个元旦，他曾在日记开头部分说：“酒适可而止。工作适可而止。应知生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应知酒是慢性自杀。”才对酒有了更多戒心。小津嗜睡，尤其喜寐，“睡午觉”“打瞌睡”等字眼不停地重现，就像日记中寂静的鼓点，不时地就要敲一下。有时候客人来访，亦酣睡如故。

小津的一生，在写脚本、拍摄、居家休息的循环中度过。1953年在小津

的生命中似乎特别重要，这是他移居北镰仓的第二年，也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东京物语》。这年的日记内容比较丰富，有许多赏花、读书的细节。他对这年的花事特别留意，二月份《东京物语》的故事有了眉目之后，他就家里拔掉枫树，种上了红梅，不久又种上了杏树，还特别记下这一年梅花初绽以及“点点花瓣随风飘落”的景象。三月份是桃花，四月份一开始是山茶、棘棠、苏枋、淫羊藿、东菊、木兰，金雀花也鼓出了点点花朵，他自己种的十一株牡丹花中还有一株开了两朵，藤花也是紫色一片，还抽空为桔梗施肥。不管是白天的春风荡漾，还是月上中天、春山朦朧，他的心情都很好，效率也高。读书方面，先是年初读了夏目漱石的《明暗》，觉得其中一个叫做小林的人物写得特别好，五月到六月间一直在读《荷风日乘》，读得津津有味，爱不释手。他常去买书的是北镰仓车站前的那家书店，在那里买了《荷风全集》的前十二册，以及《唐诗选解》、藤原银次郎的《人生观》。令人惋惜的是，日记仅余上半年，下半年的不知所踪。

小津喜欢读书，可是与相扑、棒球相比，他对书的爱好有些逊色。不停地买书、读书，主要是为了从中寻找灵感，为下一部电影写脚本做准备。日记中偶有提及购书之处，所买之书以文艺类为主，有佐藤春夫的《闲谈半日》《明星发句集》，永井荷风的《墨田川》，林芙美子的《牡蛎》《岸田刘生》《古典语典》等等。他和日本文坛的一些著名作家，比如久米正雄、川端康成、志贺直哉、里见弴等人，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他拍的电影很少改编自文学作品，仅《彼岸花》《秋日和》改编自好友里见弴的原作。读得最多的，是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有些读了不止一遍；芥川龙之介似乎也读得很熟，在谈论电影文



华烟嘉景（国画）籍洪达

## 尝得山野一口鲜

金毅

第一缕春风吹过，山就醒了。山不偷懒，就像她养育出的山民也从从不偷懒。掀开覆盖在身上由落叶、枯草缝制的金黄的被子，山犹自睡眼惺忪，意态朦胧，一场春雨及时赶来，劈头盖脸地给她冲了个冷水浴，山就打了个激灵，彻底清醒了。嫩绿的小苗儿纷纷破土而出，树的枝头也钻出许多雀舌似的新芽，都是鲜艳欲滴的极可爱样子，娇弱地展示着生命的初始，同时也给山坡上披了一件崭新鲜亮的衣裳。

“我们上山挖野菜去。”妹妹提议。我成天闲得跟没头苍蝇似的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把她都看烦了。我和妻子当然举双手赞成——山野春光正好，集健身与劳动于一体的意见，是没有理由否决的。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在乡下过春节了，如果不是被这一场突如其来疫情羁留，也早已归队，能够重走童年路，再做少年事，当然喜出望外。妻子出生在大城市，不认识野菜，更没有挖过野菜，对山珍野味农作物的认识基本来自菜市场，现在不用手机就能到“天然超市”去免费“淘宝”，新鲜之中带着几分期待，更是欢欣鼓舞。

村子对面的山头，名叫“山地岗”，是一道山的脊梁，据说荠菜、婆婆丁和鼠曲草长得很是热闹，却没人理睬，无人采摘，听上去正被大家暴殄天物。野

让我难以理解的是，山地岗这个地方，土质含沙量高，下场雨不一会便踪迹全无，像个漏斗，涵不住水的田绝非良田，庄稼产量要比别的地方低，比较遭农民冷眼。可这野菜反倒选择在此安身立命，传宗接代，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真是匪夷所思。也许，这正是野菜的聪明处，既然进不了人们的主菜单，想得到人类的悉心呵护是不可能的，那就让出肥沃之地，把家族转移到蔬菜庄稼的后方去，想咋长就咋长，既提高了生命的安全度，还落得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近年来，国人的餐桌上风云突变，荠菜、婆婆丁等咸鱼翻身，身价飞涨，一些农民把握商机，开始人工种植。不过，生活在风霜霜雪的塑料大棚里，娇生惯养，野菜不野，似菜非菜，似乎少了原汁原味。

妹妹细心地教我们如何识别这些山野珍馐，以免把兔子的美食也拾掇到篮中来。数量长得最多的是荠菜，也容易辨认，长在空旷处的荠菜全身贴地，颜色青中泛黄，叶子呈锯齿状，向四周舒展开来，像四仰八叉地摊着手脚晒太阳。这种荠菜往往有点老，纤维粗，干涩紧硬，口感稍差。那些长在树下或者潮湿处的荠菜，才是我们要找的上品，它们挺着茎往上蹿，碧绿翠绿灵灵嫩生生的，如豆蔻年华的少女婀娜站立

法和表演的文章里专门引用过芥川的《手绢》和《秋山图》。去世前那几年，乱翻枕边书是常态。

小津亦写俳句，一辈子都在写，而佳什无多，诸如“海参肠，有余香，秋夜寒夜长”“甲斐积雪斑驳，恰似松阪五花肉”之类的诗句，暴露了他的吃货本色。母亲去世时，他正好在蓼科，“恰好在饮酒，食鱼冻，享用晚餐。白日变长，六时尚薄暮。夕阳遍染远处山脉，让我想到（歌川）广重的湿抹布。”其后构思《秋刀鱼之味》，有感而发：“樱如虚无僧，令人忧郁，酒如胡黄连，人肠是苦。”两个多月后写有短句：“吾之庭院，牡丹今年又盛开。花虽盛开，母亲却已归西天。”皆是丧母后写下的佳句。

也许是下了一夜春雨的缘故，鸟雀们中午时分也喧闹个不停，风儿将莺燕语遥遥地传到楼上来。疫中烦闷，唯有此事悦耳爽心。一边听鸟，一边在窗下读小津日记，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小津对声音的敏感。他记下雨声，记下风吹在电线杆上的声音，记下钟声，记下卖豆腐的喇叭声；他还记下了窗外的第一声莺啼，山中的第一次蝉鸣，海边松林中云雀的叫声，五月深夜里不时传来的布谷或水鸡的啼鸣，以及秋天蟋蟀的悲声。声音之外，这部极简主义风格的日记也记录下自然中许多瞬间即逝的光影，如白雪下长出的第一缕新绿，照射在拉门上的暖洋洋的阳光，山上天野屋的土仓呈现出的白色等等。1935年3月14日，小津安二郎在日记中写道：“春日迟迟，函岭遥远。阳光照射在旧隔扇上，令人感到无尽的寂寥。”那景象是日常的，也是动人的。

那淡淡的寂寥，也可以说是小津比较重要的电影主题。他说，他想减少戏剧性，想在内容表现中不落痕迹地累计余韵，成为一种物哀之情。因此，他的电影通常没有激烈的冲突，而是张爱玲所说的那种“参差的对照”，是那种振幅较小的张力，总是在婚丧嫁娶的家庭琐事与舒徐温婉的风格中暗示出人生悲哀的本相来。而享用美食，昼夜喝水，听花听莺，读书写诗，拍电影，乃是他排遣人生寂寥的方式吧。

2019年的1月我在北京待了些日子，有天下午，特地去探望了张琬老师。她的家在中国建筑设计院的一幢老楼里，我去过三四回了，奇怪，每回去总要费点周折在小区绕几个圈子，再烦劳她电话里指点迷津才能找寻得到。这回也是如此，所幸天气晴好，在大好的冬阳下，我走得背脊微汗，身上暖暖的。

伴着几句寒暄，张琬老师将我带入了客厅，一杯清茶、一份蛋糕已放在了沙发前的茶几上。我在沙发上坐下，喝下一口茶，便与她轻松聊了起来。她家的墙上挂着几幅她的祖父张元济先生为她写的书法，我先来时总爱爱在字前看。元济先生的字我向来喜欢，起笔落墨尽是学人铮铮的风骨和轩昂的气宇，至今总看不腻。这回发现这些字换成了复制品——原件在2017年张元济诞辰150周年时，连同其他不少张元济的遗物，都被张琬与弟弟张人凤共同捐给了国家，海盐博物馆那年办了“张元济先生后人捐赠文物展”。言谈间，她说起我的爱好篆刻来：“我有一本篆刻的书送给你。”我嘴上说好，心里多少诧异，她从事了一辈子的英文工作，从未听说过她对这“雕虫小技”有过兴趣，怎么会有篆刻的书？只一小会儿工夫，她从另一间屋子拿来一本深蓝封面的书放到我手里。这是本原印印谱，封面左侧用毛笔认真真题了签：涉园印存。

我仔细细读这本印谱，里面共收有30枚印章31枚印稿（有枚印章是两面印），边款12枚，印章钤盖得沉着清晰，可惜边款拓得模糊不见精神。两枚5公分见方的大对章“张元济印”“壬辰翰林”，在2017年“张元济先生后人捐赠文物展”的展厅里使我记忆深刻。两印一朱一白，用刃苍润劲秀，静穆浑融，十足秦汉印的气韵。人凤老师曾回忆自己小时候见到这对印章放在一口玻璃罩内，是元济先生为商店写招牌时钤用的。“张元济印”篆刻的时间在1944年，落款“吴朴刻”，“壬辰翰林”单款“厚厂治印”。吴朴是吴朴堂，号厚厂，生于1922年，自幼喜爱篆刻，是王福庵的学生，年少即成名于杭州。18岁在清和坊开了家店，为人治印谋生活了，19岁时王福庵又为他代定润例。抗日战争时期元济先生经济陷入窘困，1943年开始鬻字贴补家用，1943、1944两年间请人篆刻了近百枚印章，大部分是挚友陈叔通请吴朴刻的。陈叔通格外器重这位年轻的篆刻家，自己不少印章亦由他操刀，新中国成立后还推介他去了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古物整理部工作。可惜吴朴薄福浅，1966年才44岁就下世了。

张琬老师说元济先生的近百枚印章一度被全部抄走了，后来落实政策归还了这30枚。1986年她的父亲张树年请友人把这些印章做成印谱6本，印屏4幅：“这本是留给我的，我弟弟那里有一本，其他放在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等地方。”她说。我继续翻阅着印谱，其中另有谢庸、陈巨来、王福庵之子王硕吾等篆刻家为元济先生篆刻的“张元济印”“元济”“菊生”等印章，大大小小我都不陌生，元济先生的书里、册子里见过许多回。这些自用印之外，有两枚印章于张元济先生有着特殊的意义。

张元济的十世祖张奇龄，号大白先生，是明万历年间著名的博学之士，元济先生为这位先祖写过这样一段话：“吾家世业耕读，自有明中叶族渐大，而以能文章擅科第者，首称丁卯九公，然绝意仕进，潜心义理经济之学，门弟子极盛，咸称曰大白先生。尝筑屋城南，读书其中，今所谓涉园也。”九世祖是张惟赤，大白先生之子，别号螺浮，顺治十二年的进士，在朝中当过官，但不徇名、不避谤，刚直言性的性格让他任宦海浮沉中很不顺意，若干年后归隐故里，将大白先生的城南读书处作了一番扩建，改名涉园，在其间葺花种竹，赋诗建饮，也为乡里修学校、賑饥荒、浚河道、建房屋，造福一方。只是到了元济先生父辈时家道渐渐衰落，涉园也随之荒废了。当年海盐县武原镇南门外有个乌夜村，相传得名于东

我把我印谱拿在手里面翻了又翻，不忍合上，不知不觉，天色就暗了下来。张琬老师掌上灯，屋内顿时亮起印谱上那一抹印泥鲜红的亮色。她说吃了晚饭走吧，我说好，于是两人在手机上点了晚餐，两碗南瓜粥，一份榴莲饼，一份马拉糕，一份卷心菜，直到8点，为了不打扰她休息，我告别离开了，带着那本印谱、那份蛋糕。

# 张元济遗印

唐吉慧

唐吉慧，涉园即坐落在此。元济先生生于广州，14岁才随母亲回到海盐，而后一生漂泊在外，对故园却时时惦念。张琬老师记得上海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老宅客厅的东墙上挂过四幅青绿山水，画的正是《涉园图》。上世纪二十年代元济先生回乡扫墓，从亲戚处得知一位族人在涉园遗址种地时挖出一枚印章，3公分长、2.5公分宽、1公分高，印文为“家住城南乌夜村”（下图右），他断定是大白先生或螺浮公时期的遗物，便买了下来，这枚印章自此成了他的案头珍爱。

1927年10月18日，元济先生经历了一场“奇遇”。这天晚上他正在极司非尔路家中二楼用餐，突然闯入五人持枪将他架走了，吓得家人不知所措。绑匪以为元济先生是大老板，向家人索要30万赎金，后经调查发现原来只是一介寒士，赎金遂一减再减，20万、15万……最终家人四处奔走，靠着典当、借贷勉强换来1万元，让元济先生脱险而归。“名园丝竹竟豪家，聊遣闲情倾曲来。逐队居然充票友，倘能袍笏共登台。”“岂少白裘兼杜厦，其如生计遇艰难。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俯看。”这两首诗是元济先生身处绑匪老窝的第一天、第二天作的，未收入他自己编订的《盗窟十诗》中，读之可见他的镇定和幽默。元济先生在10月28日给汤友和的信中说绑匪认为商务是他一人的私产，何况去年给女儿的陪嫁都有30万，所以要赎金30万：“弟相与大笑，令派人复查。越两日来言，实出误会，惟事已如此，总望酌量补助，故所费亦为数甚微。然在弟则已觉所负匪轻矣。在彼中先后数日，饮食起居，尚无大苦。惟日光、空气几于绝无，幸贱体尚堪支撑，元济先生的书里、册子里见过许多回。这些自用印之外，有两枚印章于张元济先生有着特殊的意义。

张元济的十世祖张奇龄，号大白先生，是明万历年间著名的博学之士，元济先生为这位先祖写过这样一段话：“吾家世业耕读，自有明中叶族渐大，而以能文章擅科第者，首称丁卯九公，然绝意仕进，潜心义理经济之学，门弟子极盛，咸称曰大白先生。尝筑屋城南，读书其中，今所谓涉园也。”九世祖是张惟赤，大白先生之子，别号螺浮，顺治十二年的进士，在朝中当过官，但不徇名、不避谤，刚直言性的性格让他任宦海浮沉中很不顺意，若干年后归隐故里，将大白先生的城南读书处作了一番扩建，改名涉园，在其间葺花种竹，赋诗建饮，也为乡里修学校、賑饥荒、浚河道、建房屋，造福一方。只是到了元济先生父辈时家道渐渐衰落，涉园也随之荒废了。当年海盐县武原镇南门外有个乌夜村，相传得名于东

我把我印谱拿在手里面翻了又翻，不忍合上，不知不觉，天色就暗了下来。张琬老师掌上灯，屋内顿时亮起印谱上那一抹印泥鲜红的亮色。她说吃了晚饭走吧，我说好，于是两人在手机上点了晚餐，两碗南瓜粥，一份榴莲饼，一份马拉糕，一份卷心菜，直到8点，为了不打扰她休息，我告别离开了，带着那本印谱、那份蛋糕。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